

懷念法舫法師

上生三十週年

高永霄

一、緣起

公元一九八一年十月三日乃太虛大師的弟子法舫法師上生兒孫的三十週年紀念日，法舫法師繼承其師之遺志，為促進世界佛教徒的聯合而努力，因而導致世界佛教友誼會的成立，而法師乃成為第一位中國佛教徒的代表，參加在錫蘭根地（Kandy）召開的第一屆世界佛教友誼大會^①，提高中國佛教徒的地位，居功至偉。

二、法師在港澳期間

現在老一輩的港澳佛教人士，對於法舫法師的名字，並不會感到陌生的，因為法師於公元一九四九年五月間，曾經從中國來此，卓錫香港和澳門，達九個多月的時間，其時應各方面之請，八啓講席，法筵盛開，與港澳佛教人士，結下了深厚的法緣，極為大眾所稱頌和讚許。

當法師初抵香港時，住寶蓮下院，為家所請，開講「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皈依三寶品」。六月間，轉往大埔墟壁廬駐錫，應

慈祥法師、果圓法師之請，在該地講「唯識三十論」^②，而在七月，東蓮覺苑林楞真苑長，及王學仁居士亦請法師重講該論。其後，法師遍遊港九各佛教名勝，與當時在港的佛教大德往還，法師繼在香港正覺蓮社，應覺光法師及陳靜濤居士之請講：「佛教對人生的看法」^③。同時更連續在會璧山居士、馮公夏居士主持之香海蓮社，及澳門寶覺佛學社先後以同一題目講述：「一個修學佛法的程序」^④，另應竺摩法師之盛情，在澳門佛學社講：「佛教的真理與救世方法」^⑤。最後又在荃灣鹿野苑，講了一座「大乘起信論」，而每次法筵，聽眾擠擁，可說座無虛設。

當法師留港期間，得到各方面的幫助，出版了他在印度寂鄉國際大學於二年前所譯的阿耨樓陀論師造之南傳對法論藏要典「阿毘達磨攝義論」(Abhidhammathasangaha)，為我國翻譯巴利文聖典的嚆矢。法師在該書之扉頁上，寫上：「獻給中國現代佛教領袖太虛大師，錫蘭智嚴東方學院院長達摩難陀長老(Ven. Sri Dhammananda, Maha Nayaka Thero of Vidyalankara Pirivena, Ceylon)」，作為紀念法師的兩位已故導師。

後來，法師於公元一九五〇年初離開了香港，回到錫蘭大學任教，主講「中國佛教史」，其間在五、六月間，出席世界佛教友誼會的成立大典，在會議中，對世界佛教徒的聯誼方面，貢獻

良多，並於大會後，曾寫信給香港及澳門的佛教大德，希望能夠組成「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會」^⑥，以便日後港澳佛教徒能夠參與世界性的佛教運動，由此可見，法師對於港澳佛教的前途，關懷備至。可惜當該會於兩年後成立時，法師已經不能親自目視了！

法師終以教務繁忙，積勞成疾，不幸於公元一九五一年十月三日以腦溢血之疾，捨報於錫蘭智嚴東方學院。以法師生於公元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計之，年僅四十八歲，而法臘為三十一。

當港澳佛教人士得聞法師示寂之噩耗後，十分震動，乃聯合於十一月十一日假座東蓮覺苑開追悼會，以表哀念，會場之內，輓聯之多，難以計算，寓意沉痛，同感悲傷。參加者有千餘人，除香港澳門各寺院道場之主持外，尚有當時我國留港之碩學大德，如印順法師、竺摩法師、敏智法師、優曇法師、妙欽法師、演培法師、續明法師、道安法師、隆根法師等，可說是備極哀榮，在香港佛教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

三、法師的生平

法舫法師原籍河北省井陘縣人，乃農家子，年幼時，以避旱災至北京，就學於法源寺義學，並於公元一九二一年，依南嶽是岸長老薙度出家。翌年，法師聞太虛大師創武昌佛學院，乃結伴南下，從太虛大師在佛學院修學二年後，轉入北京藏文學院習藏文，並隨留藏學法團西行，以環境關係，中止康定，欲求藏密，後以違緣，返回武昌，在武昌佛學院自修數年，學業猛進，對唯識、俱舍之學，尤其心得。

公元一九三〇年秋，法師被大師任命教學於北平柏林教理院，兼任世界佛學院籌備處書記。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大師召返武昌佛學院，任世界佛學院圖書館主任，於院中主編「海潮音」雜誌。其後在斷續之五年中，凡三編該刊。同時大師並命法師主持院中所設立之預科及研究部，故法師學譽日隆，時為漢口佛教正信會所請，教化衆生，隨機說法。

公元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發生，抗戰開始，法師應學友法尊之約，轉入四川，主持漢藏教理院院務，兩三年間，成績顯著，乃法師之力也。

當太虛大師訪問世界各國歸來後，商得我國教育部的同意，出資遣派法師赴錫蘭，弘傳大乘佛法，法師旋於公元一九四〇年九月中旬，由渝飛滇，經滇緬公路，出國至仰光，因護照問題，停留在緬甸年餘。其時適值太平洋戰事發生，日軍已佔領印支半島，侵泰國，緬甸危在旦夕，戰爭迫近，法師幸得錫蘭僧達摩密索師為嚮導，由陸路步行去印度，辛苦備嘗，終於公元一九四二年二月抵達印度，入住國際大學，在該大學研讀巴利文一年。

翌年夏，法師離開印度，轉赴錫蘭，住智嚴東方學院，深造巴利，修學南傳經典，如阿毘達摩攝義論，清淨道論等，法師本其毗曇之舊學，進求錫蘭之南傳，因地隨宜，小行大隱，十分難得，後西安籌設巴利三藏院，中錫互換留學僧，皆由法師之力以導成之。

公元一九四六年六月，法師得印度中國學院院長譚雲山之邀請，再返印度，宣講佛學，期內更譯成阿毘達摩攝義論為漢文，翌年春，太虛大師示寂，法師以武院舊業及巴院新猷攝持無人，乃經馬來西亞，香港歸國，在星洲及馬來西亞時，應當地佛學社之請，曾演講多次^⑦，大受佛教徒之歡迎，法師在星馬停留半年，於公元一九四八年五月由廈返抵上海，首禮太虛大師舍利於奉化雪竇寺，因被舉為寺主^⑧。

法師嗣回武院，重開講席，並翻譯南傳巴利文三經為中文^⑨，公元一九四九年春，法師離開了武院及世界佛學院圖書館，到長沙講金剛經，開般若法會，更受湖南首刹瀟山密印寺為主持，後以國事日非，戰事漫延到長江，乃離開湖南船山學社，於四月杪到廣州，取道香港，重回錫蘭講學，詎料法師在返回錫蘭後，不足二年，竟以示寂聞，殊為可惜。

四、一個佛教徒的楷模

縱觀上述法師之一生事蹟，法師乃是一位好學不倦，精進修

學的佛弟子，從他親炙太虛大師，進入武昌佛學院開始，繼而轉學於北京藏文學院，主持柏林教理學院及世界佛學院圖書館主任，其後在印度寂鄉國際大學攻讀巴利文，最後更在錫蘭智儼東方學院研究巴利多年，可說是孜孜不倦，勒於修習，治學精神令人佩服，所以學有所成，故對於毘曇、俱舍、唯識，南傳上座部之學皆能通曉，在言語文字方面，法師善中、英、日、巴利等語文，可謂博學多材，難能可貴。

法師是一位和藹可親，待人接物的僧人，所以凡是與法師相處的人，都稱讚法師的品德優良，慈祥和悅的盛譽，從他在國內和國外、星、馬、港、澳等地，都受到熱烈歡迎的情況來看，法師的被人尊崇的程度，便可見一斑。法師對於後學，更是愛護備至，當他主持武院教務時，對各同學的關懷，猶如父母之愛子女一樣，令他們莫不銘感五中^⑩。

法師對於溝通國際佛教文化的工作，可說是不遺餘力。他是繼承他的老師太虛法師的宏願，將中國的大乘佛法，和印錫的南傳上座佛法互相交流，乳水融會，打成一片，所以他自己首先以身作則，南下印錫，任勞任怨，做着開路的工夫，好待後來者得以循路而行，這種精神，令人敬佩，而法師致力於世界佛教友誼會成立的籌備工作，在國際佛教運動中，也是留下不可磨滅的功勞，更對於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會的誕生，起了催生的作用。

法師體格魁梧，音聲宏亮，登壇說法，如獅子吼。而說話態度，則溫雅而誠摯。法師知識廣博，且通世法，故演講時所採用的方法，適逗機宜，善於運用詞彙，新穎而精確，配合時代的需求。他說：「在講解的時候，爲了初學者易於了解起見，故對專門術語，在不違反原意之下，多用現代語說明。」^⑪可見法師不是拘謹固執的人。

法師對於弘法的熱誠，可說是爲法忘軀，法師在錫大任教，對此職務並不十分滿意，可是既來之，則安之，結果還祇好繼續幹下去。公元一九五〇年，法師會一度因發生血壓高症，而在醫院中留醫了一段時期，出院後仍担任教職，這門職務可能就是縮短他的生命最大助緣！法師爲了預備講稿，日夜忙着翻書和執筆

。況且，他對於寫英文稿子又不會有寫中文那樣容易，這實在是一項使他極費腦力的事情，但是他爲了弘法，自己的身體也顧不得許多了。

公元一九五一年夏天暑假期內，他動身去馬來西亞，忙了幾個月，主要的任務是替錫蘭大學的教授馬拉錫格拉博士^⑫，佈置到那邊去旅行。所以，馬博士一到那邊，法師即响導他遊歷各地，回到錫蘭之後，繼續他的講學。

在該年秋天的假期（九月）內，法師又應馬拉錫格拉博士之邀，陪他遊歷錫蘭各地，沒有休息。因此，在那一年間，法師實在過於勞心勞力，除了前一年五月間，在錫蘭參加了首屆世界佛教友誼大會外，其他的活動便是如此。法師雖然自己知道有血壓高的病，但在一年來並沒有去檢查過一次，的確不注重自己的身體，在他個人實在是菩薩心腸，奮不顧身，爲著國際佛教運動而奔走^⑬，最後，法師連自己的性命也貢獻給佛教了！

寫到此處，學入也就此擱筆了。總結一句；法舫法師是現代佛教徒的一個最好的楷模。在法師上生到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們能夠找得到有幾個像法師一樣的佛教徒呢？

註：

- ① 第一屆世界佛教友誼大會（W. F. B. General Conference）於公元一九五〇年五月廿五日至六月六日舉行，選出錫蘭代表馬拉錫格拉博士（Dr. G. P. Malasekera）爲首任會長，出席者有二十九個國家的佛教代表。
- ② 該次講詞爲黃本真、張儀模所紀錄，單行本翌年在港出版，書名爲：「唯識史觀及其哲學」。
- ③ 該兩次講詞亦以同樣題目出版單行本，並附錄法師在長沙船山學社所講之「佛學之真理與應用」。
- ④ 該次講詞登刊於「無盡燈」雜誌第一卷第二期，乃竺摩法師所紀錄者。
- ⑤ 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會於公元一九五二年七月成立，發起人有馮公夏、顏世亮、釋印順、釋竺摩、達慈祥、陳靜濤、王學仁、林楞真、曾壁山、曾植儀、黃繩會、韋達、釋茂蕊等。

（下轉第頁36）

